



教学方针的源与流

□ 谢煜桐

《中央党校再度改组告竣，确定新教育计划》为题进行了报道。报道指出，中央党校再度改组的目的，据负责中央党校政治教育的彭真所说，“是使党校教育能完全吻合毛主席整顿三风的精神”。改组后，中央党校教育内容“以辛亥革命至今的中国历史为基础，以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了解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通过3次改组，确立了理论与实际联系的教学方针。正如1943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指出的：“在党校中有两种培养教育干部的方法，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抽象学习理论的方法，另一种是联系斗争实际学习理论的方法。过去的方法属于第一种，把人都学笨了。我们现在采用的是后一种方法，能使你们把问题搞通，可以保证你们在两年之内提高一步。”

马列学院时期以及随后的高级党校时期，党校对于理论联系实践教学方针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索，作出了较为系统的总结提炼和理论概括。

马列学院从在河北平山李家沟口村办学伊始，就注重联系实际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了制定好教学计划，马列学院研究了党中央和毛泽东有关党校工作的指示，特别是延安整风中得到发扬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院长刘少奇在向第一期学员讲话时，也专门阐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

1953年5月23日，马列学院在向毛泽东并党中央正式上报的《关于马列学院的教学任务、教学方针、组织机构、组织领导及党务工作的报告》中，第一次对马列学院的教学方针作出正式规定，即“学习理论，提高认识，联系实际，改造思想”。报告中说明：“学习理论，提高认识，联系实际，改造思想，应成为第一、二两部共同的教学方针，这也就是‘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的目的是为了使学生能够正确的应用这种理论去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的方针。根据此方针，制定统一的教学计划，其内容应包括理论教育计划、联系当前实际工作的计划、联系思想改造的计划、组织审查工作的计划四个方面。”上述报告体现了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以延安整风精神学习理论、改造主观世界的办学指导思想。

1956年2月1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初级党校工作的指示》中规定：“党校应以‘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增强党性’为教学方针，既要反对教学上的教条主义，又要反对教学上的经验主义。要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使学员真正领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理论的实质，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从而提高学员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增强学员的党性修养。”

进入新时期后，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不断得到新的充实与发展。1995年9月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暂行条例》规定：“党校的教育方针是，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以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为中心，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德才兼备的党员领导干部和理论人才。”2008年9月3日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第3条规定：“党校工作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2019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在第4条规定中，把“坚持实事求是，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强化问题导向，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作为党校（行政学院）工作遵循的重要原则。

理论联系实际教学方针，是党校教学，乃至党的干部教育的精髓，它就像一根红线，贯穿于党校发展的历史，也需要我们结合新的历史条件，更加深入地贯彻到今天的党校教学中。



回忆老党校教学生活二三事

□ 周 逸

3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年轻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接班人，必须立志做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忠实传人”。我作为一名党校老教员，学习后深有感触，不禁回忆起自己年青时在党校的学习工作经历。

我于1951年由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部派往中央党校（当时校名是马列学院）学习，1954年留校到党的建设教研室工作，1985年离休。新中国刚刚成立后的马列学院条件还十分艰苦。记得报到后，每个学员发了两条长板凳、三块木板，这就是床。我从上海到北京，只带了一条被单，幸好有姐姐帮助，临时找了一条褥子，总算解决了睡觉问题。当时24个女同学住在一个大教室，冬天生火炉、打开水，都由学员自行分工管理，把宿舍整理得干干净净，每天按时作息，学习生活简单而有序。

艰苦的生活没有削减我们的热情，反而成为刻苦学习的动力。党校的读书气氛十分浓厚，那时党的建设教研室初建，教学人员用了大约半年时间，苦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特别是有关党的建设部分，更是认真摘录、重点讨论，就重要议题，写文章、发表演讲。苦练基本功为日后的编写教材、开展教学奠定了基础。校领导经常提醒教学人员要静心读书，养成习惯，还向大家介绍党校的资深教员是如何刻苦钻研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系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时，每出版一本新的经典著作，学校里就争相通报，读书、讨论、研究问题，学习生活十分丰富，读书学习蔚然成风。

当时，党校的教学以“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增强党性”16字为基本方针，主要解决学员

毕业后回去工作，如何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解决实际问题，解决为什么人服务的根本立场问题。党性是党代表人民利益的集中表现，需要以党员的思想意识、政治观点、言论行动作为标志来具体衡量。学习马列主义，不仅仅是背诵定义和结论，而是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法，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党性锻炼是党教育党员干部的必修课。增强党性，立志为民成为教学的明确目标。正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党员干部，他们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目标，为开创人民的幸福家园，不惜牺牲个人利益。共产党员要接受党性考验，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党校关于党性教育是贯穿于全课程的，党的建设成为教学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校内教员讲课，还邀请了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同志来讲课。党建专业的学员还要围绕党性原则进行学习小结。小结的内容主要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性原则联系自己工作实践寻找差距，在今后的工作中如何以人民利益为重，更好地服务人民。学员们深切体会到，来党校学习不单纯要读书本，增长知识，而且要提高思想政治觉悟，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思维方法改进工作，这才是最大的收获。

党校的师生关系十分融洽，教学相长，理论联系实际成为主要特征。教员备课，要先向学员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学员的思想状况、学习情况，做到有针对性地讲课，理论联系实际解决问题。教员下班辅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同学员共同学习、解答疑难问题，互教互学，共同提高。以杨献珍校长讲课为例：他讲课前住进学员楼（筒子楼，一人一屋），与学员同一食堂就餐，随时了解学员思想情况，收集点点滴滴学习

问题，及时与大家进行交流，使得课堂教学既有深刻的理论，又有活泼的案例，气氛十分活跃。这种民主的教学方法，深受学员欢迎，达到了理论同实践相结合的目的。

党校将党的政治生活制度化。正常工作情况下，每星期六都是党日时间，要过党的组织生活。党员向党小组汇报学习和思想情况，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有时也可以在党日组织党员参加校园内的劳动或外出参观等活动。在党的建设教研室则常常安排专业学习、讨论。为了会议开得务实有效，领导们以身作则，作自我批评，教育大家不回避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鼓励大家畅所欲言，集思广益，把需要解决的问题落到实处。这些作风有效地促进了同志间学习、协商、互助，提高了业务水平和教学能力，从而形成了团结向上的动力，推动了教学工作的发展。

党校领导平易近人，关心教职员

工，甚至工作人员的后代。领导同志认为脑力劳动也很辛苦，知识分子对身体的消耗不亚于体力劳动，于是经常到食堂了解饮食供应、膳食管理情况。侯维煜校长乘车外出，凡看到党校的职工，总要停下车，问一下去哪里，只要顺路，就邀请上车同行。我的女儿刚来党校，不愿意去托儿所，正闹脾气时被杨献珍校长看到。于是要求党校托儿所研究为什么孩子不愿上托儿所。随即，托儿所开展了学习延安保育院精神，阿姨像妈妈等活动，使孩子们更加喜欢阿姨和老师，逐渐爱上托儿所。

回忆老党校的教学生活，那种刻苦学习、乐观向上的氛围依然萦绕在身边；全体教职员与学员同心同德，努力工作，在学习与实践中，发扬党的三大作风，认真修炼党性，立志为民服务的精神令人永远难忘。

（作者系原中央党校党的建设教研室主任）



马列学院的学员楼

魏晋信札书法之美

□ 陈振熙

力？历史上很多书法理论家都试图解读其中的缘由。一种观点认为书法具有崇古和传承的内在习惯，所以年代越久远越受推崇。唐代书法家孙过庭在《书谱》这部书法作品中引用了魏晋时期书评家的话：“彼之四贤，古今特绝；而今不逮古，古质而今妍。”这些书评家认为：“四贤”（钟繇、张芝、王羲之、王献之）是古今最杰出的书法家，然而当代不如古代，因为当代书法趋于妍媚，而古代书法保持质朴。孙过庭对这种观点进行了驳斥，他认为“质以代兴，妍因俗易”，古与今是一个相对概念，“古”是过去的“今”，“今”又是未来的“古”，岂能以古今来划分质妍？就像酒有浓有淡，书法也应有质有妍，有传承有变革，这才符合万物的规律。用孙过庭的原话来概括，就是“淳醪一迁，质文三变，驰骛沿

革，物理常然”。

还有一种观点是从中和之美的角度来阐释这种现象，明人项穆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在《书法雅言》中说，王羲之书法“穷变化，集大成”，成功地把严肃与飘逸、对立与和谐、情感与理智、法度与自然、遒劲与流美、质朴与巧妙等相对应的元素完美地统一起来，浑然一体，中和了各种美的风格。项穆评论的书法观点同样也受到后世的一些批驳，质疑他把艺术与学问等同起来，认为内容越丰富、元素越多样，书法成就越高，所以他把王羲之比之孔子，将其尊为书法道统的集大成者。这种观点忽略了标新立异、独树一帜也是艺术追求的重要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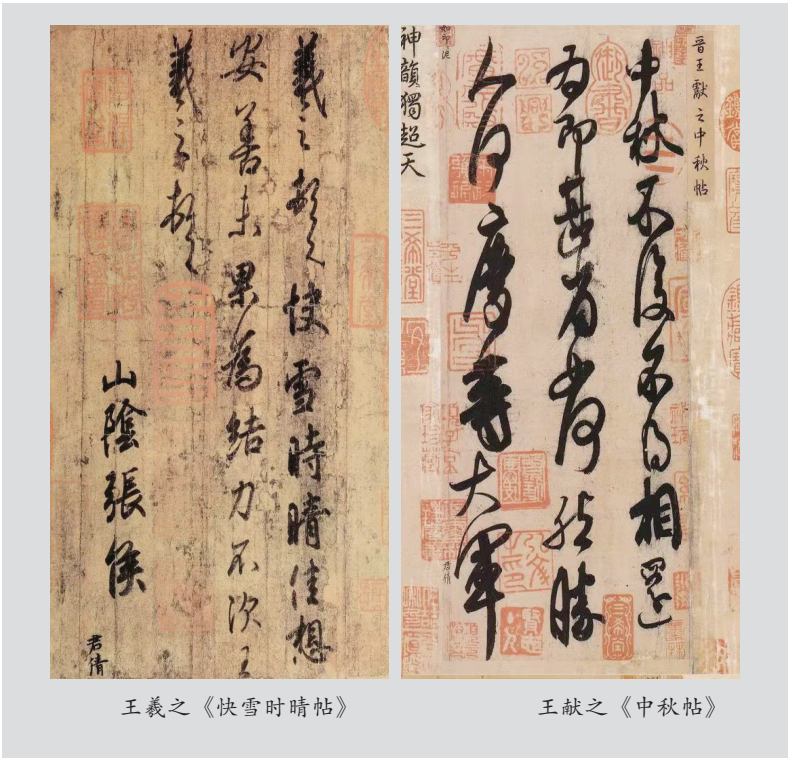
关于魏晋信札书法的美学讨论，观点多样，非常丰富。而实际上，魏晋书法家们当年在铺纸研墨、运笔挥毫的时候，想到的也许并不都是书法之美，而还有与知己的交流之情。信札在魏晋士人眼里，不只用来信息传递，更具有情感交流的功能。从王羲之留存后世的摹本书帖可以看出，大多数内容都是问候叮嘱、寄托哀思、表露心情等日常叨念。如《快雪时晴帖》写道：“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这28个字真正的意义不在于字面上告诉对方发生了什么，而在于向对方传递思念之情。可以说，在这个帖上最能突出表达作者当时心意的，是印记着书写过程的文字本身。

现在人们可以借助图片、声音、视频等载体远程交流，而古人除了文字外，没有太多可选择的交流途径，客观上限制了情感的表达。而将所有的情感都倾注于笔端，这一点魏晋书法家们当是做到了极致，就像王羲之的《频有哀祸帖》写到“奈何奈何”时候，突然运笔急促，一气呵成，一笔而就，哀痛之情跃然于纸。这样的书写形式，淋漓尽致地抒发了王羲之

写信时“频有哀祸，悲摧切割”的刻骨哀伤。这种情感的交流在现代看来，似乎含蓄而蕴藉，然而对于风流自赏、任情随性的魏晋士人而言，却是他们生活中与亲人朋友交往的常态。

魏晋士人择友的标准很高，朋友就是知音，在理想、志趣、审美等方面气息相通、趣味相投。知音之交，贵在言简意浓，妙在心领神会，直白的表达方式显得平庸俗套，理玄识奥的只言片语，甚至洒脱的率性而为，则能创造出无限意境，显得韵味无穷。《世说新语·任诞》记载这样一个故事：王子猷（王羲之之子王徽之）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雪夜访戴的故事虽然重在刻画王徽之随“兴”而为的性情本色，却也真实反映了魏晋士人清淡而又纯深的交友文化。

当信札书法“遇上”知音文化，便实现了写信者与收信者审美的高度契合。一方面，写信者把收信对象的欣赏作为其创作的全部意义，就像贾岛诗中所言：“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另一方面，写信者也把收信对象看作外化的自己，就像俞伯牙和钟子期那样，高山流水、以心相会。因此，魏晋士人在写信札时，既实现了自由的创作，又自信作品能被外界所认可，这种自由与自信的交汇，内在和外在的统一，形成了艺术创作的臻于至善。这或许就是魏晋信札书法得以登上书法艺术巅峰的真正原因吧。



王羲之《快雪时晴帖》

王献之《中秋帖》